

中 华 文 史 新 刊

宋末元初四明文士及其诗文研究



杨
亮
著

戴表元、袁桷为宋元之际著名学者、文学家，也是浙东四明文士群体中的代表人物，其言行著述对元代的文学理念和诗文转型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本书在重点分析袁、戴等人物个案的基础上，对宋末元初的四明文士作了群体考索，并编撰了四明文士活动年表，有助于对这一时期文学、学术嬗变轨迹的研究，对推进文学史建设有积极的意义。

中 华 书 局

中 华 文 史 新 刊

宋末元初四明文士 及其诗文研究

杨 亮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末元初四明文士及其诗文研究/杨亮著. —北京：中华书局，2009.6

（中华文史新刊）

ISBN 978-7-101-06714-9

I. 宋… II. 杨… III. ①古典诗歌—文学研究—中国—宋代～元代②古典散文—文学研究—中国—宋代～元代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55389号

书 名 宋末元初四明文士及其诗文研究

著 者 杨 亮

丛 书 名 中华文史新刊

责任编辑 张 耕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9年6月北京第1版

2009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630×960毫米 1/16

印张25³/₄ 插页2 字数300千字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6714-9

定 价 56.00元

目 录

导言	1
第一章 四明文士心态及政治倾向发微	18
第一节 宋元易代之际四明文士心态变化与遗民 意识蠡测	18
第二节 易代之后生活境遇的改变与心态之蠡测	35
第三节 宋元易代之后心态及政治立场之蠡测	43
第四节 袁桷心态及政治倾向蠡测	52
第二章 四明文士文学理论及其主张	68
第一节 文学理论主张背景之考察	68
第二节 诗贵精专说的提出	74
第三节 前人诗学资源的广泛借鉴	76
第四节 袁桷对戴表元理论的继承与发扬	88
第三章 前期四明文士舒岳祥、戴表元诗文活动研究	103
第一节 遗民视角下舒岳祥等人的诗歌	105
第二节 由外向内的转向:个人叙事视角的转换	115
第三节 宋末元初辞赋风向之转变	141
第四节 戴表元辞赋:哲理世界的深化与拓展	148
第四章 后期四明文士袁桷任职翰林国史院机构变迁及 文士活动	161
第一节 翰林国史院机构之沿革	163
第二节 翰林国史院地址之变迁	170
第三节 袁桷任职之翰林国史院职能变化及扩大	172
第四节 翰林国史院文士及大都文士群体之活动	198
第五章 后期四明文士袁桷诗文活动研究	210
第一节 元代馆阁及馆阁体含义之探讨	211

第二节 四明文士袁桷各体诗歌及其实践	220
第三节 元初文坛格局与袁桷散文背景的考察	244
第四节 袁桷散文师法渊源及实践	253
结语	275
附录 四明文士活动年表	279
主要参考文献	396
后记	405

导 言

在文学史中,当我们视野集中于宏大事件或伟大人物时,历史似乎就是由这类事件或人物构成,然而我们如果追溯事件的前因后果,或是欲了解某一时段的详情时,往往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历史详情会被我们有意无意地遮蔽,其具体情形往往是付诸阙如,语焉不详。即使我们想理清其中的线索也感到困难,这往往会受到历史资料的限制和历史观念的影响。“一切过去的历史都必须联系到当前才能加以理解。当然,既是过去的历史,就需要有证据;但是这类证据却是今天的史家在此时此地的当前世界中所现有的某种东西。”^①当把视角投诸宋末元初南方四明文士群体时,就会发现历史事件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历史往往并非按照我们设想的路径前进,而是犹如捉迷藏一样扑朔迷离。“历史就是思想史,因此历史上就没有什么纯粹的‘事件’,每一桩历史事件既是一种行为,又表现着行为者的思想。史学研究的任务就在于发掘这些思想;一切历史研究的对象都必须是通过思想加以说明。”^②四明文士群体的前期人物舒岳祥、戴表元,后期人物袁桷都在当时文坛产生了重要影响,可以说元代的文学理论观念和诗文转型都和这一群体有关,但后世对之并未有足够的注意。

本稿注重了对此一群体的整体性考察,后期四明文士研究将切入点放在元代的翰林国史院的背景之下,避免空泛简单的叙述。力图“再现”这些历史,“这些复活都有着完全内在的动因,无论多少文

① 英 柯林·武德著 何兆武、张文杰译《历史的观念·译序》,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20 页。

② 英 柯林·武德著 何兆武、张文杰译《历史的观念·译序》,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27—28 页。

献和叙述都不能使它们再生;相反,它们自身在收集文献和叙述并放置面前,缺少它们,文献和叙述就会分散零落和毫无生气。若不从精神本身即历史这一原则出发,将根本不能理解历史思维的实际进程。”^①这就要求我们不能将视角仅仅关注于文献材料的罗列,而是要求我们在对文献材料使用与选择时不仅要谨慎而且要有很强的辨别力、洞察力,这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研究这一群体没有现有成果可以借鉴,即不仅要有文献依据,而且要有广泛的视野,有理论框架的支撑。“历史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它的资料就在我们自己的胸中。因为,只有在我们自己的胸中才能找到那种熔炉,使确凿的东西变为真实的东西,使语文学(以文字性历史文献的校勘、训诂和考据为主的学科)与哲学携手去产生历史。”^②

景定五年,宋理宗去世,《宋史》对他的评价是:“怠于政事,权移奸臣,经筵性命之讲,徒资虚谈。”^③而即位的宋度宗,贪图享受,懦弱无能,根本没有能力应对王朝内部和北方强敌蒙古的复杂问题,因而新皇帝的即位并没有带来新气象,而是面对内部经济趋于崩溃、党争不断,外有强敌压境、亡国在即的局面。丞相贾似道自景定元年(1260)吴潜罢相之后,独任宰相,开始咸淳十年中控制朝政、独揽大权的贾似道时代。时代变局和每个士人息息相关,四明文士群体的舒岳祥在咸淳元年四十七岁,戴表元二十二岁,他们的命运也就在这时期开始发生变化。因而本稿将四明文士群体研究时间从南宋度宗咸淳元年(1265)始,至元泰定帝泰定四年(1327)袁桷去世,标志着四明文士群体的终结止,时间跨度共有六十二年。其空间范围前期以四明一地为主,后期随中心人物袁桷北上,活动中心从四明渐转至大都。研究人物以宋末元初舒岳祥、戴表元、袁桷为主。他们为当时文坛领军,以四

① 意 克罗齐著 田时纲译《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5 页。傅任敢从英译本转译克罗齐的著作,为《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13 页,字句已经有所不同,但大致意思相同,显然英译本已经有所改动,但对历史背后的精神因素的理解显然是一致的。

② 意 克罗齐著 英 道格拉斯·安斯利英译 傅任敢译《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14 页。

③ 元 脱脱等《宋史》卷四五《理宗本纪》,中华书局 1985 年新 1 版。

明为活动中心,师承渊源明确清晰,主张一致,力纠宋末文风的颓弊与江西诗派的流弊,以建安文学和唐代诗歌为楷模。其爱好与旨趣相同,也使诗风与文风相近,随着袁桷北上,其“宗唐得古”主张占据主流;史学上,尊崇“实学”,对学术进行总结,以《玉海》、《延祐四明志》二书最为人知;儒学上,四明本为陆学重镇,但此派以调和朱陆争端为主,为元时朱陆合流的前奏。因其学派传人至袁桷之后逐渐湮没无闻,其群体也长期被忽视,如欲明了宋末元初文坛实际,及这一时期的文学发展走向,四明文士群体也有重要研究价值。

地域观念梳理:从地域观念上来看,浙东本为一广泛地名,后演变为学术群体称谓,这其中也包含四明为主的学术群体。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载四明属江南道,当时为明州,以境内有四明山而得名。宋王存《元丰九域志》两浙路条:“上,明州,奉化郡,奉国军节度。”^①下辖鄞、奉化、慈溪、定海、象山、昌国六县。《舆地广记》所记与《元丰九域志》相同^②。《方輿胜览》卷七《庆元府》条:“元宗时以越州之鄞县置明州。以境内有四明山,遂名。唐末为钱氏所据,皇朝改为奉国军节度。中兴,兼沿海制置使,绍熙五年,升庆元府,领县六,治鄞县。”^③《舆地纪胜》所记亦与《方輿胜览》相同,四明治所设在鄞县,南宋孝宗绍熙五年升为庆元府,元时改庆元路,《大元混一方輿胜览》江南浙东道肃政廉访司庆元路亦有记载:“扬州之域。春秋时吴封越,东至鄞,越灭吴,欲徙吴王甬东,即此境。秦置鄞县。唐置鄞州,元宗置明州,以有四明山在。宋升庆元府。”^④又记其郡名为四明、甬东。《元史》卷六二《地理五》:“浙东道宣慰司都元帅府。元治婺州,大德六年移治庆元。庆元路,上。唐为鄞州,又为明州,又为余姚郡。宋升庆元府。元至元十三年,改置宣慰司。十四年,改为庆元路总管府。”^⑤元时其所辖之地为鄞县、象山、慈溪、定海四县,及奉化州、昌国州二州。可知元时

① 宋 王存《元丰九域志》卷五《两浙路》条,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13页。

② 宋 欧阳忞《舆地广记》卷二三《两浙路下》,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54页。

③ 宋 祝穆《方輿胜览》卷七《庆元府》条,文海出版社,据孔氏岳雪楼影抄本影印,第149页。

④ 元 刘应李原编 詹友谅改编《大元混一方輿胜览》卷下《庆元路》,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13页。

⑤ 明 宋濂《元史》卷六《地理五》,中华书局1976年版。

浙东道宣慰司治所当在庆元,而四明为庆元之别称。袁桷《延祐四明志》卷首《序》引马泽之言:“明旧有志,今为帅大府。浙东七州,推明为首。阨塞户版,物产地利,是宜究察以待问。清风旧德,与昔之高閼巨闕属于宅里者,犹可考也。”^①四明为浙东道宣慰司之治所,其地理位置重要,人材极为繁盛,故历代方志屡有记载,《輿地纪胜》卷一一庆元府风俗形胜条:“四明据会稽之东,抱负沧海,枕山臂江,重阜崇岭,连亘数千里。山川之胜,雄杰茂异,所以人才英拔,比他郡为甲。”^②自南宋以降,经济重心南移,浙东本为繁华富庶之地,虽经济对文学刺激并不直接,但富庶的经济则为教育发达提供保障,而教育发达则又为文学繁荣提供必要条件,故宋、元二朝此地书院众多,未受改朝换代的影响,皆以经济繁荣、重视教育之故。浙东文学和学术繁荣,亦有由来。

学派梳理:以学术观点视之,浙东学派为此背景之产物。在浙东一地,北宋有“永嘉九先生”,南宋有浙东各学派产生之雏形,著名者有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杨简、袁燮、舒璘、沈焕等为代表的四明学派。巩本栋《中国学术与中国思想史》中对浙东学派和内涵均有论述,认为其有涵养德性的实用价值及经济世务的实际效用^③。这代表了目前学界对浙东学派的认识。今人言及浙东学术多受章学诚《文史通义》之影响,章学诚之思想自胡适阐明后,其学术多为今人重视,故屡有言及。章学诚在《浙东学术》中言:“浙东之学,虽出婺源,然自三袁之流,多宗江西陆氏,而通经服古,绝不空言德性,故不悖于朱子之教。至阳明王子,揭孟子之良知,复与朱子牴牾。蕺山刘氏,本良知而发明慎独,与朱子不合,亦不相诋也。梨洲黄氏,出蕺山刘氏之门,而开万氏兄弟经史之学;以至全氏祖望辈尚存其意,宗陆而不悖于朱者也。……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各因其习而习也。”^④

章学诚对浙东学派阐述有开启之功,其立论着眼点为明清学术

① 元 马泽修、袁桷纂《延祐四明志》卷首《序》,《宋元方志丛刊》第六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

② 宋 王象之《輿地纪胜》,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614—615页。

③ 巩本栋《中国学术与中国思想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74页。

④ 清 章学诚《文史通义》,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23页。

史源流和发展脉络,关注点为明清浙东学术。其他如章太炎、梁启超等人并未超出章氏认识范围,关注点皆在明清二代,章太炎认为:“然自明末有浙东之学,万斯大、斯同兄弟,皆鄞人,师事余姚黄宗羲,称说《礼经》,杂事汉、宋,而斯同独尊史法。其后余姚邵晋涵、鄞全祖望继之,尤善言明末遗事。会稽章学诚为《文史》、《校讎》诸通义,以复歆、固之学,其卓约近《史通》。而说《礼》者羈縻不绝。定海黄式三传浙东学,始与皖南交通。其子以周作《礼书通故》,三代度制大定。惟浙江上下诸学说,亦至是完集云。”^①明清浙东之学者皆为大家,源流甚为明确,自不待言,其影响至今不绝如缕^②。然自宋时浙东学术已经形成,元时则更为明确,时人甚少注意而已。元时代浙东之学成就以四明文士为主,他们的成就更多的体现在诗文领域。

实际上真正对浙东学术深有研究的是清人赵一清,他在《浙学源流考》一文中对此有所论述。不过赵一清和章学诚相比,名声不著,很少有人注意。赵一清注意到了四明群体,明确提出了四明学术的观点,其言:“吾浙又有四明、姚江之学。四明自‘庆历五先生’后,有‘淳熙四君子’之目。五先生者,杨适、杜醇、楼郁、王致、致弟子说,隐居乐善,节操高洁,乡邦敬仰之。袁正献公燮、杨文元公简、沈端宪公焕、舒文靖公璘,四君子同师西江陆氏。朱子每称文元为己功夫,持庾节日首疏荐之。《宋史》究以非洛闽正传,故不列之《儒林》。列《儒林》者为庆元王伯厚应麟、慈溪黄东发震。东发纯厚端悫,伯厚闻见赡敏,均足不朽。”^③赵一清已经注意到了四明文士群体,但对王应麟的传人舒岳祥、戴表元、袁桷却未提及。

欧阳光《论元代婺州文学集团的传承现象》、《从文人群落到文人集团——元代婺州文人集团再研究》二文,是目前从流派角度分析元代浙东学术的力作,作者认为:“婺州文人群落之所以能够发展衍变为区域性文人集团,正是亲缘、乡缘、师缘、友缘不断强化并形成合力的

① 章太炎《章太炎卷·清儒》,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54—255页。

② 今人何炳松《浙东学派溯源》对浙东学术的产生进行了总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何炳松的关注点实际上仍旧是史学,对于文学并未涉及。至于宋末元初的四明文学的地位及其在后世的影响,后世很少有人注意。

③ 清 赵一清《东潜文稿》,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5页。

结果。一个文人集团的形成,离不开众多的因素,例如是否能够产生成就突出又具威望的领袖,是否能够在一些特定问题上形成共识并群力贯彻实践等等。但这些都属于文人集团的共性,不管属何类集团都不可或缺;而以亲缘、乡缘、师缘、友缘为联系纽带,正是区域性文人集团独具的个性。以利益的一致或趣味的相同而形成的文人集团,往往易聚也易散;而由亲缘、乡缘、师缘、友缘这四条纽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区域性文人集团则特别稳固和长久。”^①欧阳光对婺州文人集团的研究结论和四明文士活动的实际吻合。四明一地为浙东之首,教育发达,名人辈出,文学传统深厚。四明文士之间以师生之谊、同乡之谊、亲友之谊为联系纽带。且四明文士学术活动与文学主张在元代的影响更大,更为持久。对此情形,四库馆臣认为:“桷少从戴表元、王应麟、舒岳祥诸遗老游,学问渊源具有所自。其在朝践历清华,再入集贤,八登翰苑,凡朝廷制册、勋臣碑版,多出其手。故其文章博硕伟丽,有盛世之音。”^②四库馆臣指出了王应麟、舒岳祥、戴表元、袁桷之间师承渊源,而且注意到了袁桷的学术路径和四明文士群体之间的关系。

对此学派认识最为深刻者是清代学者全祖望,其《胡梅磶藏书客记》言:“南湖袁学士桥,清容之故居也,其东轩,有石窖焉。予过而叹曰:‘此梅磶藏书之所也!’宋之亡,四方遗老避地来庆元者多,而天台三宿儒预焉:其一为舒闾风岳祥,其一为先生(按:指胡三省),其一为刘正仲庄孙,皆馆袁氏。时奉化戴户部剡源亦在,其与闾风、正仲和诗最富,而梅磶独注《通鉴》。”^③全祖望所提到的三人都属于四明文士群体的范围,南宋末,元兵南下,文人避地四明,最著名者有舒岳祥、刘正仲、胡三省、戴表元,他们受袁桷之父袁洪之聘,曾与袁桷有师生之谊,其中戴表元与袁桷相往过从最长,他们相互交往,互相唱和,促进了诗歌发展,对南宋末诗文流弊认识较为深刻。由于文化修养较高,多为进士出身,宋亡之后全力倾注于诗文,如王应麟为当时东南文坛盟主,

① 欧阳光《从文人群落到文人集团》,《中国古代戏曲与古代文学研究论文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536页。

② 清 永瑆《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七《清容居士集》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

③ 清 全祖望《胡梅磶藏书客记》,《全祖望集汇校集注》卷一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092页。

舒岳祥为著名诗人,戴表元为东南散文大家,而且形成了系统诗文批评观点,在元初有重要影响。袁桷为南方文士入元的代表人物,在元初南北文风融合与过渡中有重要作用。全祖望言:“宋之亡也,遗老自相唱酬,时则深宁王公为主盟,陈西麓尤工诗,寓公则舒闾风、刘正仲之徒咸预焉。已而有陈子鞏、郑奕夫、徐本原、章垒诸君嗣之。清容学士之家居也,鹿眠山人裒以兄弟相应和,而蒋远静辈皆为故家之良。”^①此则材料勾勒出宋元之际四明文士活动的大概情况,宋亡之后隐居不出的王应麟常与刘正仲、舒岳祥等人唱和,而后来主盟者为袁桷,其在元初文坛有重要地位,我们可以看出四明文士群体的作用与影响。

学派师承自袁桷之后传承不明、没有出色的传人是四明文士群体被后世忽略的重要因素之一,且袁氏家族在袁桷身后逐渐没落,这与浙东学派的婺州学派不同,因婺州学派在元代除有柳贯、黄潛之外,在明代尚有著名文士宋濂,故其学派在《元史》和《宋元学案》传承极为清晰,而四明学派在《元史》与《宋元学案》中记载语焉不详,所以未引起后人足够重视。

目前对这一学派研究尚少,仅有朱迎平《永嘉文派考论》一文,对这一学派有所涉及,认为:“永嘉文派在南宋后期文坛声势颇盛,影响很大,承传最久,显然与这种传演方式直接相关。但另一方面,这类文派由于师门关系的束缚,往往摹仿多而创造少,使弟子难以超越宗师。永嘉文派的主要传人陈耆卿、吴子良、舒岳祥、戴表元之文,虽具有典型,各有可观,但总体上都难及水心。”^②朱迎平将他们都归结为永嘉文派,这本身还有可商榷的地方。从文学发展角度来说,舒岳祥、戴表元等人由于身处时代巨变,目睹国亡家变,生活由富裕转向困顿,他们不得不为生存而辗转奔波。这些变故使他们在文学上有了与叶适不同的一面,那就是从事功转向文学本身,更侧重于文学艺术的追求,从这一角度来说舒岳祥诗歌、戴表元散文、袁桷诗文在当时都有其独特价值。

^① 清 全祖望《句余土音序》,《全祖望集汇校集注》卷二五,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233—1234 页。

^② 朱迎平《永嘉文派考论》,《宋文论稿》,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28—129 页。

以作家个体研究视之,对舒岳祥^①、袁桷^②研究较少,对戴表元^③研究相对较多,但多集中于其诗论主张。在四明文士群体研究中,本稿集中于舒岳祥、戴表元、袁桷,除了他们之间师承渊源明确之外,还在于他们具有典范意义。他们诗文方面的创作成就值得重视,同时在当时具有引导改变诗文风气的作用。四明其他文士,如袁裒、陈著、史蒙卿等人虽然在当时有一定影响,但在文学的创作中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艺术成就不高,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宋元诗文转型中不具有重要意义,因而在本稿的研究中不作为重点。

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其一,研究一个没有涉及过的流派,不仅要具备丰富的史学知识背景,还要具有全局性的眼光。宋末元初的思想与文学变局,当时士大夫思想心态及与文学关系,元初文坛格局及其在后世的影响关系到明清之后的诗文研究,甚少引起后人注意,故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其二,本研究注意了文献和文学的结合,并没有局限于文本的分析,力图从原始文献入手,结合考证以求得出确实的结论,比如对四明文士活动年表的详细制定和考证,就立足于文献的分析与综合,通过揭示文士的活动可以展示当时士人活动实际、心态变化、诗文变化,同时对四明文士在历史和文学史中的定位可以有更好的了解。

其三,本研究注意了历时和共时的考察。文学流派的形成、发展、演变,有一个变化过程,其变化往往会和这一阶段的文学走向有关。

① 有关舒岳祥研究,以民国时期干人俊所作《舒阆风年谱》最为深入,但作者当时没有利用《永乐大典》残卷,对其诗文还可补证。另外,对其行踪及诗文系年考证还有重新订证之处。2000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方勇《南宋遗民诗人群体研究》一书,对舒岳祥诗文风格略有涉及。目前有关舒岳祥研究,因各种文学史少有提及,故可以说处于空白。

② 袁桷生平可以参看笔者2004年广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袁桷年谱》和《袁桷生平、学术渊源及心路》(刊于《殷都学刊》2006年第2期)。袁桷作为四明学术与文学的集大成人物,对其研究可以解决元代文化转型问题,因而不应该孤立研究,而应该放在更宽广的视野之下进行。

③ 论文主要有查洪德《综百家之长,开一代风气——戴表元的理学与文学》(《殷都学刊》2002年第1期),张晶《论戴表元的诗学思想及其在宋元文学转型的历史地位》(《内蒙古师大学报》1998年第3期),2004年复旦大学刘飞博士论文《戴表元及其文学研究》,论述了戴表元身世、交游与著述、诗歌、散文、诗学思想。查洪德《理学背景下的元代文论与诗文》第九章《戴表元:承百家之绪,开风气之先》对戴表元的文论有专章研究,代表了目前研究戴表元的新成果(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29—257页)。

因而必须从其学派的历史渊源入手,同时在研究中注意到同时期其他人物的文学主张、诗文特点的比较,这样所得结论才会可信。

其四,在研究中注意到整体与个体的差异与比较,四明文士的心态、政治倾向和理论主张因为有着延续性、典型性,故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对待个体的研究,并非仅就诗文分析,还注意到个体风格的形成环境的不同。比如,对袁桷诗文的研究,是本稿的一个重点,对其诗文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出宋元之际诗文的转型,因而切入点就选择了元代翰林国史院及大都文士群体之间的活动。切入点的选择可以明了个体在当时文坛的作用及诗文风向的转变。

本稿分为六个部分,有以下观点,并力求解决以下问题:

第一部分:从整体上考虑,认为宋末元初四明诸子历经亡国之痛,他们对待元政权也有一个由拒绝到认同的变化过程。四明诸子的政治倾向代表了当时南宋区域文士的看法,具有典型性。后世对待易代之际文士的心态和政治倾向的认识往往不足,其实这关系到诗文风气的转变,在当时及后世都有影响。本稿认为四明文士的心态及政治倾向经历了由拒绝认同到主动与元廷合作的过程,这个过程虽然复杂,但仍然可以理清其中的线索,这也是大多数南宋遗民所采取的态度。在传统社会中,儒士命运出路的选择十分无奈,通常他们只有与权力阶层合作,才能保障自身地位,而这种路径的选择是他们生存的主要方式之一,因而四明文士群体的选择具有普遍性。后世在分析遗民心态与倾向时从民族感情的立场或是为尊者讳的角度出发,将其绝对化、范式化,因而所得结论有所偏差也在情理之中。

第二部分:四明文士舒岳祥、戴表元、袁桷等人是在对南宋末文风批判的基础之上形成其文学理论主张的。他们对南宋末诗文风气有深入体会与了解,他们的文学理论主张有着一致性和延续性,这点在当时南宋末的文士群体中较为突出,其群体从宋末舒岳祥、戴表元开始,在南宋区域有了地方性的影响,一直到袁桷任职大都,具有了全国性的广泛影响,显示了其派别的持久性和影响的深远性。前期四明文士戴表元在四明、杭州等地广泛交往,后期四明文士袁桷以大都翰林国史院这一机构发生影响,他们对南宋诗文风气的批判持续而深入,在形成元代诗文风貌方面有特殊的贡献,因而他们的理论主张及其实实践具有转型性的意义。本稿从其文学理论主张的背景、诗贵精专说的

提出、对前朝诗学资源的广泛借鉴几个方面来探讨其理论内容及影响。

第三部分:对四明文士群体的研究,本稿关注的不仅仅是其诗歌,而且对他们的散文也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中注意到了南北双方的文学格局的不同,及后期文学观念融合的情况,联系当时文学与学术的特点来进行。目前有关元代的散文研究仍是空白,可以弥补其中的不足。

首先,就诗歌内容说,舒岳祥的很多作品表现出故国之思、遗民之痛,但其弟子戴表元诗文极少表现这方面的内容。以往论述戴表元诗歌时,多将其作品归结为遗民之思和故国之痛,如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中言:“以序记碑志最为出色,大多写于宋亡之后,流露了对故国的怀念和对时政的不满,感慨至深。”^①邓绍基主编《元代文学史》言:“前人说戴表元诗歌内容的主要特点是多伤时闵乱、悲忧感愤之词。这主要是指那些流露故国之思的作品。”^②复旦大学刘飞博士论文《戴表元及其文学研究》中亦将戴表元诗歌内容的故国之思、遗民之痛作为一个主要方面。这说明了对戴表元研究的深入,不过如果说他有故国之思的话,那么就涉及了戴表元究竟是否有遗民心态的问题。本稿认为戴表元的诗歌在主题取向上故国之思很少,这和戴表元的生活经历有关。

其次,戴表元作品据郁松年刻宜稼堂丛书本《剡源集》记载,其散文包括辞赋在内有二十六卷之多,诗仅有四卷^③。其创作包括中国古代散文文体的各个方面,可以看出戴表元在散文方面的努力程度和影响。戴表元为了谋生创作了很多应景之作,这些作品艺术成就确实不大,格局不高,这在中国古代文人中是较为普遍的现象,但他的序记和辞赋类作品在宋末元初的文人创作中较为突出。

本稿认为,就戴表元自身的地位来讲,他在宋末和元初的政治地位都不高,在元朝仅仅任职路学教授而终。和其弟子袁桷相比,在政治地位上较低。和赵孟頫相比,在政治地位上更是天壤之别。戴表元

① 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508页。

② 邓绍基主编《元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25页。

③ 刘飞《戴表元的著述及其流传考略》,《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4年第6期,第16—20页。李欣《戴表元诗文集版本研究》,《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第20—22页。

更多的是在南方文人群体的交往中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以朋友之间的影响来发挥自己在文坛中的作用,因而他在文坛上的影响更多的是一种个人行为,较少政治性的目的。

最后,本稿讨论了戴表元辞赋的价值,将其辞赋放在历史中定位。随着宋朝的灭亡,科举制的取消,律赋的废除,辞赋观念发生了转变,到元仁宗延祐年间重开科举,标榜古赋,意味着元人的赋学风气也发生了变化。

元人对所谓古赋的认识正是循着这一过程而找寻其理论依据,这体现了元人辞赋观念的保守立场,也和元人的创新性不足有关。从唐代开始的律赋,宋人独创的文赋,都表现出创新性。而元人因其疆域广大,对自身文学的空前自信,因而在文学对象取舍上以汉、唐盛世气象来作为模仿对象。元朝统治者所信用的儒士多是金源区域的文人,他们在儒学和文学上普遍采取复古主义的立场,表现为继承有余而开拓不足的特点。而在故宋区域的文人也认识到故宋诗文风气的弊端,如戴表元、赵孟頫、袁桷等人作出了相应的努力。在建立新的诗文风气之前,必然在理论依据上从古人身上找寻,这导致南方区域的文人也普遍接受并积极采取一种复古主义的立场。可以说,当时辞赋领域以《楚辞》和汉赋为模仿对象的文学活动是南北合流的结果,正是在这一潮流之下,科举考试中才会出现舍弃律赋、尊崇古赋的现象。

戴表元人生经历充满了忧患与凄凉,而正是靠着哲理的思考使其内心得到安慰。可以看出,对哲理世界的探求和追寻是他精神世界不断开放的途径,也使其心智不断扩大、充实。内心世界的缜密,是人生摆脱悲剧命运、摆脱不可抗拒的宿命的一种主要手段,戴氏《缩轩赋》等作品的叙述体现了此点。生活的贫困、人生境遇的无奈并不能遮蔽戴氏对人生和宇宙的体认,相反戴氏用更为睿智的态度去认识自己所处的世界,其体认的境界虽有些世故,但更多的是历经忧患之后的大彻大悟,所以戴氏的叙述世界与外界有一定的距离,他的内心的紧张感、焦灼感充满了整个篇幅。

第四部分:对后期四明文士代表人物袁桷的研究,除了其心态和政治倾向外,力图避免平面的肤浅的研究,而是另辟蹊径,将袁桷放到翰林国史院这一背景之下进行研究。可以注意到四明文士袁桷在翰林国史院这一机构中发挥自己的影响以及在南北文士交流中的作用。

实际上翰林国史院这一机构在当时文士活动中有重要作用,四明文士在从南方向北方的过渡中的作用正是凭借翰林国史院这一机构进行。认识到翰林国史院的作用,等于解释了为何元代诗文领域出现了风格的一致性和理论的趋同性问题,明于此,就不会对宋末元初的诗文作笼统的负面的评价。所以虽然本稿是就四明文士袁桷的诗文进行研究,但却涉及了元代诗文转型的问题,具有代表性和典范意义。

首先,本稿认为元代翰林国史院在元代诗文风气的形成中有重要作用,当时文士的活动是通过翰林国史院得以进行,元代很多著名文人几乎都有在翰林国史院或集贤院任职的经历。南北文风交汇,相互碰撞,翰林国史院起着重要作用。以元代的翰林国史院为视角来研究当时文士之间的相互交往及诗文活动无疑更有意义。

本稿探讨了元代翰林国史院职能及文士活动,包括翰林国史院机构沿革、翰林国史院地址、翰林国史院职能(涉及的方面有起草诏书文诰、青词、祝文等,探讨了翰林国史院实录的纂修、前朝史书的编撰等,注意到了祭祀等事的职能活动)。

其次,注意到翰林国史院文士及大都文士群体的活动。南北文士借助翰林国史院这一机构的聚会,使南方文士的诗文观念传布到北方,并且和原来金源区域文士的诗文观念相互融合,使南北诗文观念得到融合。

翰林国史院文士之间相互聚会题诗唱和的风气较为盛行,与宋代馆阁翰苑相比,并不逊色。邓文原、赵孟頫、虞集、袁桷、贡奎等南士在诗文理论上已趋于一致,提倡所谓雅音,目的是革除南宋以来诗文格局柔靡纤弱之习,在对南宋末年诗文风气批判的同时,逐步确立了元代转型时期的诗文观念。

元武宗、元仁宗时期体现的是南北诗文风气的融合和理论的渐趋一致,这种同题集咏的方式无疑是文士切磋诗文技艺的最佳交流方式。

馆阁及其相关的馆阁诗风本身就是一个较难理清的问题。比如在翰苑任过职,但不久又任外职,在任外职期间所作之诗算不算馆阁体,他的创作是否和馆阁有关,这些问题都有探讨的必要,本稿进行了概念界定,厘清了其内涵。

第五部分:袁桷从入仕起就在翰林国史院任职,时间几乎三十年,